

右图：拉合尔市政委员会在拉合尔近郊的夏利马尔公园举行市民招待会，欢迎刘少奇主席。图为刘少奇主席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传真照片)







# 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毛泽东

## 管好教好青少年是一场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

——太原市举办电视工读中学的经验

中共太原市委

### 管好教好城市青少年

的一种好形式  
电视工读中学把没有升学的高小毕业生组织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使他们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 依靠群众 勤俭办学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大寨、大庆为榜样，充分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是一九六四年九月举办的。

太原市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随着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小学教育和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高小毕业生升学的要求。这些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年龄较小，既不能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在城市就业也有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过去几年，我们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如举办一些普通中学，多招收一些学生；组织和动员厂矿企业举办读班，还组织一部分学生回原校补习，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每年仍然有一部分高小毕业生呆在城市，闲散起来。其中有些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沾染了某些坏习气。这些情况说明，如何管好教好城市未升学的青少年，不仅是解决他们的学习问题，而且是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问题。

为了把升不了学的高小毕业生管好教好，进一步普及城市初中教育，我们创办了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把他们组织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一定技术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这些学生经过三年学习后，既有条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有条件升入高一級学校学习。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原来只有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两个班，现在已有初中一、二两个年级，七十个班。教师和辅导员由三十二人增加到九十一人。设班地点由城区扩展到厂矿和郊外农业生产大队。学生的生产劳动基地也逐步建立起来。城区三十三个班的学生与三十三个厂社就近挂钩，参加工业生产；郊区十四个班的学生，就地参加农业生产。

电视工读中学的教学形式比较灵活。教师利用电视教学，在电视台设一讲桌，学生就近编班，分散在各个设有电视机的教室里听课。每班配备一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辅导员，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学生听课，辅导学生自习，批改学生的作业，还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开展各种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学校已经开设的课程，有普通初中级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并准备增设工农业基础知识 and 外语课程。学生每星期六个半天上课，三个半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三个半天是自习和课外活动。

建校一年多的实践证明：电视工读中学是管好教好城市青少年的好形式之一，它为没有考取初中的高小毕业生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特别重要的是，电视工读中学采取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的办法，使学生在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增长了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这就大有利于青少年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为参加工业生产劳动和继续升入高一級学校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年多来，我们体会到举办这种学校有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少花钱，多办事。这种学校用的教师少，教的学生多，设备简单，只要有一个教室，一部电视机，一些课桌，一个辅导员，就可以增设一个班。经费开支比同样规模的普通中学省得多。第二，提供了培养教师的条件。每个班都设有一名辅导员，他们和学生一起听教师讲课，又要辅导学生听课，还要和学生一起参加劳动，这就有助于使他们锻炼成为一种新型教师。第三，讲课教师要受简、少而精、短促的原则，必须自觉地克服“少而精”、“启发式”的原则，教好，这也促使教师开动脑筋，改革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一年多来，我们的路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太原电视现场教学班数学教师杨玉秀正在教代数



新华社记者 王文西摄

学和原来不打算升学的学生。在他们中间，不少人学业成绩比较差，有的人思想觉悟不高。入校初期，学生不遵守学校纪律，在课堂上贪玩吵闹，有的班简直乱得上不了课。本来有些教师和辅导员就认为学校摊子小，设备不好，房屋破旧，有点心灰意冷，又看到这样一些学生，越加发怒起来，不愿意长期干下去。这个问题，既反映了一些人不理解办好这所学校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问题，也反映了他们还有着追求旧型正规化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害怕艰苦的思想。

在充分暴露思想的基础上，学校组织教职员工大学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关于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帮助大家提高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组织教师 and 辅导员深入学生的母校，深入学生的家庭，深入街道，进行广泛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学生中间，多数学生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由于有些学校和家長没有抓紧对孩子的教育或教育不得法，致使有的学生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许多活生生的材料，深深地教育了教职员。大家认识到管好教好这些青少年，正在自己的岗位上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具体体现，正是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重要任务。因此大大加强了政治责任感，决心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去管好教好这些学生。

但是，有的教师和辅导员对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还缺乏教好的信心，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沾染的习气较深，不容易教育过来，流露出消极畏难情绪。抓住这个问题，又组织大家开展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对待学生是一分为二，全面地看，还是片面的只看他们的缺点？是发展的看，还是静止的看？经过辩论，大家认识到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他们是会进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资产阶级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青少年争夺过来。

### 从阶级教育入手

要管好教好青少年，必须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师，教育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办法是从阶级教育入手。

明确了管好教好学生的重大意义，坚定了管好教好学生的决心和信心以后，首先整顿纪律做起。在整顿工作中，有些辅导员发生了急躁，采取简单的办法企图压服学生，结果失败了。以后，又空讲大道理，也不解决问题。原因何在？进一步深入了解以后，才弄清学生纪律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目的不明确，不懂得他们为什么。因此，管好教好学生的中心一环是教育他们树立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

为了使学生们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首先组织学生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并且组织学生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扫墓，请老工人、老红军、贫下中农讲革命斗争故事，讲党史，开展学习雷锋、王杰的活动，开展团队活动和小组活动，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学生受到了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开始在学校内部形成一个遵守纪律、勤奋学习和积极向上的新风气。

为了使青少年得到全面的发展，学校一方面注意争取设点单位、挂勤劳动的厂、社、队和家长和社会力量，都管理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强调辅导员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许多辅导员通过与学生同学习，同劳动，同活动，同娱乐，同休息，同生活，然后对症下药，循循善诱，从而收到比较显著的效果。永定路电视班学生李根源，经常骂人打架，惹事生非，这个班的辅导员李淑华针对这个情况，首先访问了他的家庭，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个老工人，妈妈早就去世，在教无父教育，家务劳动繁重，养成一种自私和粗野的性格，还发现他同校外的一些流氓混在一起。李根源的情况后，改变了原来只靠李根源缺点的片面观点，经常细心考察，发现这个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劳动很积极，她抓住这个优点，表扬他。对于李根源生活上的因素，主动进行帮助，使李根源感到老师对自己的关心，主动向老师靠近。平遥华抓李根源的这个转变，就联系他的家史，对他进行阶级教育，辅导他学习毛主席著作，使他懂得了将来要为人民服务好，现在就得好好学习了，逐渐树立了为革命学习的正确目的，能够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办好事，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个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在辅导学生自习  
边街电班辅导员马新华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双塔西街电视班二年级学生在南城区铁木加工社参加劳动。这是老工人魏文生（左）在给学作技术指导  
新华社记者 王文西摄

“捣蛋鬼”大有转变，被评为优秀队员，还被选为班主席。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觉悟，在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学生安心学习，遵守纪律，团结友爱。今年以来，已有三百多名学生参加了团课学习，提出入团申请，有些人已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我们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电视工读中学也受到学生家长 and 广大群众的热烈赞誉。

### 在劳动的熔炉中锻炼

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培养了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他们说“练了手，红了心”。

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学习生产技能，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电视工读中学建校一开始，就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和工农业生产劳动。从去年三月开始，学校进入和二十三个厂社签订合同，实行厂社挂钩，形成固定性的生产劳动基地。这些厂社大都是以手工操作为主，学生容易学，也比较安全。同时，这些厂社又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适应参加分散设班的特点，便于组织学生就近参加劳动。参加劳动的具体办法是，辅导员带领学生每周进厂劳动三个半天，固定时间，固定工种，固定师傅，随学随干。厂社给予一定的劳动报酬，三年毕业以后，根据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的可以参加工业生产劳动，有的可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又工又读，使学生有了两个课堂：学校教室和厂矿的车间、生产大队的田间；有了两套教师：学校的教师、辅导员和工人师傅、贫下中农社员，使学生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学生一进厂、社，向师傅们进行了劳动目的和劳动意义的教育，还给他们讲厂史、社史、老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史，使学生没有亲身经历过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听了老工人、老贫农的充满血泪的家史以后，认识到旧社会是“高天、穷人的地”，认识到阶级的本质，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个别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也进一步认识到剥削阶级的罪恶本质，决心要与剥削阶级彻底划清界线。在劳动中，老工人不仅传授技术，而且教思想，经常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质影响学生，教育学生。学生们看到师傅们争分夺秒的干劲，一丝不苟的严肃精神，爱护公共财物的高贵品质，深受感染。他们说：“活榜样摆在旁，学习就要先学师傅的先进思想。”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学生劳动得更起劲了，组织性、纪律性更强了。一些厌恶劳动的学生，变成了爱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学生。他们高兴地喊：“练了手，红了心”。

生产劳动，不仅使学生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活知识，而且有助于把书本知识学活。他们可以用实际知识验证书本知识，又可以用书本知识理解和解决生产上的问题。

学生劳动时，教师也定时参加劳动。开始，有的教师还强调教学任务重，时间紧，不愿参加劳动。经过一段劳动实践，许多人都尝到了劳动的甜头，从而促进了思想革命化，也促进了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

### 探索电视教学的特点

用电视教学，师生不见面，讲课教师和辅导员必须密切配合，改进教学方法，加强辅导工作。

### 应用电视设备，向青少年系统地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电视工读中学的讲课教师大部分来自普通中学，他们只有面授的经验，没有接触过电视教学，缺乏搞好教学的信心。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全校教职员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首先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通过学习《关于重庆谈判》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几篇文章，进一步懂得了“工作就是斗争”的意义；必须克服懒惰，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而大大增强了搞好电视教学的勇气和信心。

电视教学，教师和学生不见面；学生只是在一见无面的荧光屏前听课。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师生听得清，看得真，记得下，就对教师提出了很多

要求。比如，讲的内容要精，速度要适当放慢，语言要特别清楚，板书要十分工整。讲课教师必须根据这些特点进行教学。有的教师为了掌握讲课速度，通过收听广播，向播音员学习；为了使板书写得整齐，反复钻研教材，找出重点和难点，反复进行试讲。同时，他们还和电视台摄像人员密切配合，使自己的姿势，讲课的速度紧紧跟上摄影机的转动。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终于初步掌握了电视教学的规律。学生反映：“电视教学听得真，看得清，记得下，和老师当面讲差不多。”

教师们还充分发挥了电视教学一些特有的优越条件。如政治课讲到雷锋时，就放映了《雷锋》的故事片。通过这些改革，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由于教师讲课不能同学生直接见面，加上班多学生多，很难对学生进行辅导。于是就在每班配备了几个辅导员（都是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们不仅辅导学生文化学习，而且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教师板书时，辅导员在电视机旁的黑板上也板书；教师讲到重点的时候，辅导员提醒学生注意；学生自习的时候，辅导员更能发挥主导作用，在黑板上写出作业题来，让学生做；有学生提问，他要回答；要帮助学生温习已讲过的东西，必要时还要再讲一讲。学生记日记、写论文，辅导员给批阅。语文教师只教语文，数学教师只教数学，而辅导教师要门门辅导。

怎样才能使辅导员把各门课事先掌握好呢？具体做法是，校部在每星期六下午，召集一次教师、辅导员例会，汇报工作，布置任务，交流经验，各科教师提出下周的教学内容，讲重点和应注意的地方，让辅导员先学一步，并写出辅导提纲，向辅导员传授教学方法。辅导员在“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的思想鼓舞下，精心备课，耐心辅导，有的抽时间给学生上补习小课。他们既是学生学习的辅导员，又是学生政治思想的指导员、生活管理员、劳动组织者。他们每天和学生一起听教师讲课，并辅导学生自习。他们又学又教，又教又学，又学又教，自己也得到了提高。

### 领导重视 各方协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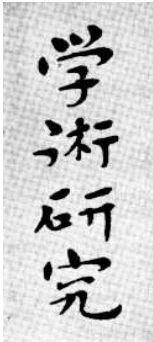
山西省委非常重视青少年教育，各有关部门在解决经费、教师、辅导员等方面，都给予了积极的帮助和支持。

电视工读中学从筹办的时候起，山西省委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几次开会研究和解决学校的重大问题。有关领导部门在解决经费、购置电视设备、配备讲课教师和辅导员等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省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积极赞助，办好电视工读中学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许多中小学和机关、厂矿等设点单位的领导干部都把管好教好青少年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积极给电视班提供教学、桌椅等教学设备和取课设备，并指定专人管理本单位的电视班。劳动部门、工业管理部门积极为学生安排生产劳动场所，卫生防疫部门指导学校做好环境卫生，保护学生的视力。总之，办好电视学校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有关方面积极协作，也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因素。

由于学校设点分散，在各个电视班的管理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学制、课程、教学计划 and 教材的安排，由学校统一制订。讲课教师由学校统一管理，各辅导员由学校和设点单位共同领导。辅导员的理论学习和党团组织生活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由学校和设点单位共同负责。电视班设在中小学校的，各校都把电视班当作本校的一个班级看待，有的还指定本校教师兼任电视班的副主任，兼教音乐和体育课。

电视工读中学所以取得以上成绩，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也是在教育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现在看来，这条路子是走对了，但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我们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大寨的革命精神，奋勇前进！





## 第一二期

在有关海瑞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的论文曾经引用一八四二年十月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三五页以下）中有关于习惯权利（法）的一段文字，以之作“辨析‘清官’行为的根据。我觉得这段话引得并不太全面、不太恰当。引用不当，部分原因可能是原文的某些段落和句词翻译得不确切或不不够明确。为了弄清谁是马克思的原意，我把书中谈到习惯权利（法）的那一段，同原文前后进行了核对，对某些关键词句作了一些我认为较合原意的修改。现在把有关段落抄录于后，并把我理解马克思这段话的大意和所提的几点意见一并提出，供大家讨论时的参考。

马克思在这篇讨论中说：

但是这些对于它不实际的人却要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伸张权利，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和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提出出来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做真正的主人之石，以便把一切肮脏的欲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别人要求习惯权利，并不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为一切国家的穷人固有的习惯权利。我们更进一步一，为习惯权利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一最低下的、一无所有的、自然权利授予的权利。

所谓特权的习惯是和法相抵触的习惯。这些习惯产生于人类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的时候，当时根据古代和传说，所有的动物都以动物的形象出现。人类被分成许多不同的动物群，决定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平等，而是法律所固定的不平等。世界上不自由的时代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人类法体现着自由，而这种动物的法与之相反，却体现着不自由。……在封建制度上也是这样，一种人靠另一种人生活，后者依附在前者的土地被一样，它有许多子孙，为另一种人靠土地上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土地为生；因为如欲在自然权利中乞食蜂杀蜜蜂，则在精神动物界中，恰恰相反是蜜蜂杀死乞食蜂——用工作把它们的

## 谈马克思关于两种权利的一段话及其译文

申 徒

折磨死。当特权者从法定权利向其习惯权利作呼吁时，则他们所要求的是不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性状态，后者现在实际上已变成纯粹是动物的假面具了。

贵族的习惯权利按其形式是是与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对抗的。它们不能制成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一般状态下的形成物。这些习惯权利同法律形式及其一般性和必要性相对抗，这一点本身就说明它们是习惯的非法律权利。因此，不能以之与法律相对抗，而只能作为法律的对抗物加以废除，甚至有时还要加以惩罚，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因为这是他的习惯而不再是不法的行为，正如强盗儿子的抢劫行为并不因为是家风而可以原谅一样。如果一个人，并故意犯罪法，那末应该惩罚的是这种明知故犯；如果他是犯法是由于习惯，那末就应该惩罚他的这种不良习惯。在存在着普遍法律的时代，合理的习惯权利也就是制定法所规定的习惯，因为权利并不因为被制定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它只不再单纯是习惯罢了。对于一个有合法权利的人，法（权利）就是他自己的习惯；这个法将没有合法权利的人贯彻执行，尽管它不是后者的习惯，权利（法）为权利法，并不取决于法是否是否合理这个偶然状况；相反，习惯成为合理的，是因为为权利被制定为法，因为习惯已成为合理的习惯。

因此，作为同制定法并存的一种个别领域，习惯法（权利）只在这个法（权利）并存在法律之外，即只在习惯是制定法的一种预示的场合，才是合理的。因此，根本看不到什么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在法律里，特权阶级不仅使他们的合理权利得到承认，而且他们的不合理权利甚至也还经常得到承认。特权阶级没有权利在法外要求什么，因为法律已把他们的一切可能权利都预计在了内了。因此，他们要求这些可能效果，这也只是作为《amens pleins》（注：小东，外译）的领域，其目的是使法律已按其合理界限加以规定的同一内容，在习惯里在合理范围之外使他们的癖好和欲求得到更多的发泄余地而已。

如果说贵族的习惯权利是一些和合理的（权利）概念相抵触的习惯，则贫民的习惯权利是同现行法的习惯相对

抗的。后者同自身所对抗的不是制定法的形式，它所对抗的毋宁是它自身的缺乏形式。法的形式倒不是同它对立并存，而是它还没有获得这种形式。……

最自由的习惯法，在私权方面，只限于为现存的权利制定其形式，把它提升为普遍的法律。在没有任何权利的地方，也就不能制定这种形式。……

这些立法不可能是片面的，因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权利，正象我们在中世纪一切制度中所看到的那样，是以一定的所有权的非固定性为基础的。它究竟是属于私有财产或公共财产，都不能绝对肯定，它是一种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立法工作用以认识这种二重形态的工具就是理智；而理智不但本身是片面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于使世界成为片面的，——这真是一件伟大而人赞颂的工作，因为它为片面的天才才能从无机物中抽出那特殊的東西而给予它以一定的形式。事物的性质是理智的产物。每一种东西要成为什么东，必须把自己孤立起来，分裂成为孤立的東西。理智把世界的一切内容纳入一种固定的范围，并把这一流动的内容凝结成为化石，从而表明世界的多样性，因为没有这些众多的片面性，世界就不会是多面的。

因此，理智应用了抽象法中那些现存范畴（其格式因此于罗马法），取消了所有权的这种两重性和非固定性。由于立法者的理智把个别的国家特权取消了，也就认为更有理由把整个不固定的所有权对贫民阶级的责任也加以取消，然而它忘记了，即使单纯从私法观点讲，这里也有两种权利（法），占有的者私权（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权（法），更何況任何立法法没有取消过所有权的国家特权，去掉的是这些特权的制作为非所有的，而赋予以公民的民事性质。中世纪的一切权利形式，其中也包括所有权，在各方面都是二重的、二元的、分裂的，而理智也就理智气壮地用自己的统一原则对抗这种矛盾的规定，但理智仍然感到了一种困难，即有些所有权对象按其本质来说永远也不能有那种早被废除的私有权利的性质，而由于前者的原始性质和它的偶然性在于只是属于先占权的范围，也就是属于这样一种阶级的先占权的范围，这个阶级正是

（《宪法论》，第十一页）

星宇同志说：“海瑞把做官的目的说成是贫苦人民打抱不平，他说：‘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忿之，忿之哀之，情不能已，仕之由是也’”（《海瑞集》上册，第七页）。“清官”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这种观点没有为荒。为贫苦人民工作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海瑞不可能有这样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表白的什么，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还是让我们看看海瑞的所作所为吧！在他给刘石固的信中说：“吴中习讼，略不关毫事情而因为大无之讼，诚可恨哉。生亦未尝不重处也。除府县外，衙门郡县不绝七八人衙，又先痛打关者之，候满当再发批。曾有解三二起，原告官中途脱逃，解人告称，闻此重处乎。心甚苦之，谓可以消清讼矣。”（《海瑞集》下册，第四四页）什么是“清”？“清”指诉讼：“既风习讼”，可见“清”是刁民之讼，即是贫苦人民去讼无厌。贫苦人民去打官司，无非是因为“饥寒驱之”或“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而海瑞却把此称为“刁讼”，这认为为风习可去，便对他施以酷刑，甚至“称月满发释免死”。并且，他知道去打官司的贫苦人民走到半路被吓跑了，非常高兴。可见，海瑞的为“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而“仕之”，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雇佣的粉饰之词而已。而海瑞却以“清”为“清”，“清”指完全无冤的，其目的还是在证明海瑞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这不能证明什么别的，而只能更加表明了星宇同志离开了阶级分析。

还必须指出的是，星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手段，他一方面引用了某派官员的一段话，含糊其辞地说“海瑞有无私之心”，另一方面，他又用曲解海瑞的话的办法，肯定了所谓“清官”们在主观思想形式方面对人民群众表现了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等思想，“可能完全是真诚的”。为了弄楚这个问题，我们把星宇同志曲解了的这一段话全引出来，加以分析。海瑞说：“在不同的所有权利形式上，生存在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由各种不同情感、欲望、思想及和世界客观关系上的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世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制。通过传统和教育来保存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在历史上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派别的言词和行动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的言词同它们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①在这里，海瑞清楚地告诉我们指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态度等，但是它们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在马克思产生以前，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行动不受物质生活条件所支配，常常把那些“传统和教育”说成是“清官”们“发自内心的”“出发点”。海瑞说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间题。揭露了“传统和教育”下掩盖着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和教育”的阶级性和欺骗性，而星宇同志却用文字说明，所谓“清官”们对人民群众表现了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可能完全是真诚的”，这个说法是否正确？这难道不是把封建阶级的“传统和教育”超阶级化了么？

其二，在研究历史人物时，要根据他们的实践活动进行评价。海瑞告诉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言词和幻想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同他们的本质区别开来，就是这个意思。星宇同志对这段话竟看到去尾忘头，便根据所谓“清官”们对于自己的看法和言词加以判断，把他们的言词门面话，当作他们的主观思想形式，当作评价他们的标准。因之，必然会作出错误的结论来。

## 三、所谓“清官”是否以封建建法为武器，

反对封建的习惯法？

所谓“清官”是用封建建法，反对封建习惯法，从而发挥其调节阶级矛盾的工具体，这是星宇同志《论“清官”》一文中的基本线索。下边我们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简单看法。

第一，对于封建建法的理解问题。星宇同志在解释封建建法时本质的说：“统治者的余欲总是要碰到一定的界限。……一般说来，法律所反映、所维护的就是不过分超过这个界限的阶级权利。……如果剥削制度超过了界限，那么便使得一定集团的统治趋于崩溃而出现新旧王朝的更替”。这就是说，封建建法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只要不过分地超越封建建法的规定，便不会引起人民的起义和农民阶级的斗争，一定的封建建法的集团，统治就不会崩溃。中国历史上所以出现了新旧王朝的更替，是地主阶级过分地超越了封建建法的界限造成的。请看：在星宇同志的笔下，封建建法和封建国家、封建官僚一样，也是为阶级矛盾的调节器。

同时，在星宇同志看来，所谓“清官”所以能起调节阶级矛盾的作用，就在于它坚决维护封建建法，反对封建的习惯法。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封建建法的迷。我们认为，法与国法是一样，是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产生的，封建建法是被提升为法律的地主阶级意识的表现，它是武断的、特权的，不能不受限制的。在这种统治下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地主对农民随意镇压甚至剥夺生命的权利。在这种压迫下建立起来的“秩序”，并没有调节阶级矛盾，正是阶级矛盾的表现。它是地主阶

级利用国家机器做杠杆，强迫农民维持下来的“秩序”，皇帝和官僚都是这种压迫法执行者。因之，农民与封建建法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农民战争爆发后，它不要打倒封建国家，也要废除封建建法。而星宇同志却在赞美它，说它可以同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的，还说它可以制止封建统治者，不过分超越它所规定的界限，就不会引起农民起义来。其根据在哪里呢？根据是有的，那就是实用主义法律学。

第二，关于封建建法和封建习惯法的关系问题。星宇同志虽然说过，“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但他实际上把封建建法和封建习惯法对立起来，并认为“清官”的本能就是用封建建法反对封建的习惯法。从两者的对立中，星宇同志使所谓“清官”找到了理论地盘，他认为“清官”是阶级矛盾的“调节器”找到了理论根据。如果说，这种看法不是马克思恩思的，下面来研究一下星宇同志提出的论据。

星宇同志为了证明封建建法和封建习惯法的对立，曾经引用过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在这里，在到处一样，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总是要使统治，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自己的传统和传统而固定下来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的限制固定下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这是区分了“传统和建法”，“传统”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可见，它们之间是相对立立的，星宇同志完全曲解了马克思的话。

“总是要使统治，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可见，它们之间是相对立立的，星宇同志完全曲解了马克思的话。

其二，星宇同志还引用过马克思另一段话：“决不能维护这种习惯权利而对抗法律。相反地，应该把它们当做和法律对立的东西废除，而对利用这些习惯权利的人也应该给予某种惩罚。”①星宇同志以此为依据，肯定反对封建建法对封建习惯法，是“清官”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源。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曲解。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在一八四二年写的，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还远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为贫民的习惯权利作辩护的，当时，德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是一个自立的阶级，广大劳动人民还不觉悟，马克思是在号召德国人民起来斗争，向德国的封建统治进行斗争，维护自己的习惯权利。马克思在这里不仅单纯反对封建习惯法，也反对了德国的封建建法和封建制度。星宇同志是混淆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界限？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吗？

我们并不否认封建建法中有权利和不守法的差别，但这是划开并讨论“清官”与贪官的标准，更不能把对守法的封建建法当作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器，否则又把封建王法置于何地呢？

四、否定“清官”的存在，是不是把所有封建官吏一律看待？

有的人认为，不承认封建官僚中有“清官”和贪官之分，就是对封建官僚都一律看待，不是“一分为二”，这样来搞与岳飞没有什么区别了。好大的帽子啊！可恨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诡辩。我们问它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那一位告诉过他们，在评价封建统治者时，必须区分出“清官”和贪官来？这种区分难道不是从地主阶级社会的生产、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照抄照搬来的概念么？这一点，在星宇同志的《论“清官”》的文章中开始就说明了。以地主阶级区分的官僚的标准，作为无产阶级研究封建官僚的标准，这能算是“一分为二”吗？

我们对于所有封建官僚是一律看待，但不完全一律看待。因为，所有封建官僚都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赘瘤，都是贪官污吏，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其根本性质。所以从法律说，给包拯、海瑞为历史的这批封建官僚摘掉“清官”的帽子，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取消“清官”的概念。但是，对他们又不能完全一律看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如我们肯定岳飞是英雄，并不因为他不是“清官”，而是因为他反抗了落后民族人民的入侵，曾对岳飞起过推动作用。对于海瑞也是一样，他修筑浙江，当时应天府一带的生产发展上来了，但他不是“清官”。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比无产阶级更尊重历史，也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象无产阶级一样，给历史人物以历史科学的总结与评价。我们决不否认历史是由人来的历史，也不否认人类在历史上曾起过过大的作用。我们要遵循唯物史论的教导，“从孔子到孙中山”给他们的以批判的总结，才能“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才能“指导当前的批判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在批判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必须和当前的伟大斗争结合起来，决不能象“清官论”者一样，无中生有的创造一个“清官”标准，来反对封建官僚阶级评价封建官僚的标准，把海瑞之流拉出来，赞美歌颂一番。这不是批判继承，这是旧史的复活。因之，我们必须给“清官论”以严肃的批判。

①星宇：《论“清官”》，《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以下凡引此书，均不另注。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三〇二、三四三页。

④《列宁选集》第十一卷，第一八一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三三八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四一八—八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四九四至五〇页。

⑧《资本论》第二卷，第一〇三五页。

## 就“清官”问题和星宇同志商榷

赵一民

提要 “清官”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上虚构的共同体。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清官”不能起到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作用。星宇同志认为，“清官”同情人民在主观上是真诚的，这是离开阶级分析的谈法。法定权利同习惯权利是对立的，否定“清官”的存在，不是把封建官吏一律看待。

关于历史上的“清官”问题，星宇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清官”》①。他肯定在封建社会里有“清官”的，并认为：“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者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清官”维护地主的法定权利，打击豪强的习惯权利，对于农民有好处；“清官”们“对人民群众一贯的同情、怜悯和关心”，如“海瑞把做官的目的说成是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等等。

我不同意星宇同志的观点，现在，把我的不同意见写出来，和同志们讨论。

## 一、“清官”是一个“虚构的共同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清官”，“清官”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共同体”。代表者是封建皇帝、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机构。它以“公正”的、代代表封建利益的姿态出现在意识形态的舞台上，起着美化封建政权、美化封建社会，欺骗人民的作用。它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只要承认它的存在，就必须陷入不能自拔的错误之中。星宇同志正是这样，他认为“清官”不是“出自贵族欺压贫贱的产物”，而是真实存在的。

在封建社会里所以没有“清官”，这是由封建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所决定的。封建官僚是这种本性的集中代表者，在每一个官僚看来，他登上天子之堂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发财致富。飞黄腾达，中国古书中，无官不富，无吏不污的话，正反映了这一普遍的现象，无一例外。所有的封建官僚都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赘瘤，吞噬一切的豺狼。马克思概括的指出：“最腐朽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②。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说有例外的“清官”。

“清官论”者认为：在千百年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清官”，“你不信看古书中记载，并且肯定地说：‘历史记载是冲不破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谁也不能不’。可敬的先生！你说错了。历史记载不是客观存在，即使它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何况这些记载又是出自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由于受阶级利益、阶级偏见的影响，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歪曲历史，不是连地主阶级自己都说‘尽忠书不如无书’吗？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命的人，反例说它是‘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冲不破’，恰恰相反，我认为，对封建史学家所做的历史记载，不仅不能冲破，而且必须冲破，不冲破它，就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冲破它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那么，客观上既然不存在“清官”，做为“清官”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虚构的共同体”是怎样产生的呢？

封建皇帝和地主阶级是“清官”的创造者和热烈的宣传者。皇帝希望他的官僚都是“廉吏”，“清官”，企图实现同其统治、传万世之业的美梦，以增加国库收入，供给个人挥霍，满足其私欲。所以，有些皇帝曾严酷过法。如朱元璋曾对于奸贪害民的官僚，使用极为残酷的刑法。最后，他还是假为假取说：“朕自即位以来，法甚严，官布列华，‘吏’，期其廉用之，并效忠也，任假伪，俱系有害。”（《明史小史》卷二）既然“俱系有害”，为什么又有“廉吏”、“清官”之称呢？这正说明了皇帝对官吏像也用两手的：一手是恩威并用严重者；另一手是“贪污不廉”而手段又巧者，称之为“廉吏”的制造，同时，又以美化自己的统治，欺骗人民。这就是皇帝“明造”和表里所谓“清官”的两个目的。“清官”也是封建官僚用来美化自己政治和道德的外衣。官吏为了爬上欺下，往往都以“清官”自命。特别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地主阶级接近于死亡的边缘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他们更加千方百计地求助这一幽灵，做为维持本阶级统治的救命草。因此，他们便给所谓“清官”加工了艺术的、神圣的光彩，搬上了舞台，写了一些离奇古怪的《小说》，不顾全力地进行扩大宣传。他们也知道：“戏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书本”，特别是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来说，更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方式。所以，自元以后，便出现了《三蝴蝶梦》、《灰栏记》、《三女校》等“历史剧”，以及《包公案》、《大红袍》、《施公案》等小说。他们企图给包拯、海瑞之流穿上神圣的外衣，来消灭人民的反抗，挽救地主阶级的危亡。

但是，广大劳动人民身受封建官僚的压榨，现实生活活活在地狱，门口敲锣开道，有罪无钱莫进关。正如列宁所说的：“农民对过去的全部生活状况他们憎恨像老牛和官吏”③。这就是说，农民对封建官僚不抱有任何幻想。当然，这个阶级也是相当复杂的，在中农以上的农民中，可能有些人对于封建官吏抱有一定